日本“倍增计划”的光影和痛楚(上)

◆ 冯武勇 郭朝飞

下村主持的“倍增计划”独到之处在于，尽管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计划，但计划落实重点放在促进民间企业的活力上。日本政府通过减税、降息等方式，以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激发了民间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。

◀日本富士山下行驶的新干线列车

1959年3月9日,时任日本财务大臣的池田勇人在《日本经济新闻》发表“我的月薪两倍论”一文。池田在文中提出，只要中央政府政策得力，在日本国民共同努力下,今后5到10年,日本人月薪翻倍甚至增至三倍绝非梦想。

翌年年底，已经成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内阁公布了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提出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(GNP)翻倍的目标,从此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的黄金十年。

实际上，日本经济增速远远超过池田当初的预期。到1970年度,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40.58万亿日元,是原定目标值26万亿日元的近两倍。

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的超额完成，不仅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,也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。回过头看，池田及其智囊团制定的“倍增计划”超越了狭义的“经济规划”范畴,而是一份改变日本社会形态的蓝图。

战后经济的转折

与任何一份社会发展大蓝图的诞生类似,日本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的产生离不开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完美结合。

在“倍增计划”诞生的前夜,日本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层面正在经历战败以来最激烈的转型。

当时，岸信介内阁因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，日本各界反安保运动如火如荼，岸信介内阁风雨飘摇,于1960年7月黯然下台。时任通商产业大臣的池田勇人在随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，接替岸信介成为日本第59代总理大臣。

“正是由于之前岸信介内阁强行通过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，池田勇人内阁上台时，日本国内政治矛盾比较尖锐,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比较厉害。因此，池田勇人上台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收拢人心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、研究员林家彬告诉记者,在这样的背景下,池田勇人提出了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,他想用这种办法把各方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来。

日本历史学家中村隆英在新版《昭和史II》中也指出,利用“倍增计划”这一经济政策,池田成功实现了国民融合，也是日本战后政治氛围的重要转折。

经济方面,日本在经历和享受朝鲜战争等“特需景气”、“神武景气”后,到50年代末,高速增长势头已开始放缓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向记者表示,“1955年,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之后，日本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，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，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将减速。”

当时日本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是:“特需”时代结束了,日本需要收缩投资和银根,以免库存过剩。1956年,日本政府在《经济白皮书》中有一句著名论断:“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”。这既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从战后废墟中走了出来,也暗示战后重建拉动的高速增长期临近尾声。因此,岸信介内阁晚期制定的“新长期经济计划”中,把今后几年的年均增长率调低到6.5%左右。

与这一主流看法针锋相对的是经济学家下村治。早在池田执掌大藏省时期,下村治就是池田经济智囊团“木曜会”的核心成员。下村治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——“设备投资的乘数理论”提出,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初期,民间投资意愿强烈,如果加以正面引导,今后年均增幅不会低于10%。下村1959年2月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发表在专业经济刊物上,引来了包括“新长期经济计划”拟定者大来佐武郎、当时日本经济学泰斗一桥大学教授都留重人、日本央行调查局次长吉野俊彦等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围攻。

池田1959年3月发表在《日本经济新闻》的“我的月薪两倍论”,其实正是对下村的一种声援。研究日本战后历史的不少著作指出,池田本人是“经济通”,他与下村的“完美组合”是催生“倍增计划”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冯昭奎认为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，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。但是,当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，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均GNP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。因此,当时日本老百姓对生活水平也有了新的要求,这也是“倍增计划”的一个基础。

“有管理的凯恩斯政策”

1960年12月27日,在经过长期酝酿后,池田内阁正式出台“国民所得倍增计划”，提出到1970年,“国民所得”，即国民生产总值从13万亿日元倍增至26万亿日元。(注：日语中的“国民所得”并非指国民收入,而是国民生产总值。)

“倍增计划”开宗明义指出,制定这一计划的目的包括:经济规模倍增,扩大就业达成完全就业，国民生活水平大幅上扬，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取得均衡发展。

林家彬告诉记者，当时日本经济主要面临地区差距扩大、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双重结构矛盾、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。

因此,“倍增计划”特别强调,将通过农业现代化、中小企业升级、加大落后地区开发力度等缩小城乡差异、工农差异以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发展落差。

下村主持的“倍增计划”独到之处在于,尽管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计划,但计划落实重点放在促进民间企业的活力上。日本政府通过减税、降息等方式，以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激发了民间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。

饶有趣味的是，当时日本民众对“倍增计划”反响颇为冷淡。

《读卖新闻》当年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,只有15%的日本民众认为十年收入倍增有望实现,多达40%认为不可能实现，另有45%回答说不好,其实也就是持怀疑态度。《读卖新闻》解读说,在众多民众看来,“倍增计划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

然而,最终事实证明,池田和下村不仅押对了赌注,而且成果惊人。当时的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显示,到1970年度,日本“国民所得”实际达到了40.58万亿日元,是10年前的3倍多,“倍增目标”的近两倍，年均增幅达到了11.6%,远超计划设定的“7.2%”年均增长目标。同期，日本人均消费支出10年内增加了2.3倍，显然经济腾飞惠及到庶民生活。

●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 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52921234转各部
●本报印刷:文新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外9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沪太、上海龙吴、上海金桥、上海界龙、崇明 /北京、深圳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本报在23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俄罗斯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南非、匈牙利、新西兰、罗马尼亚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阿联酋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等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288
本报零售价 每份 1.00元